

·“四史”研究·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统筹协调军事支出 和经济建设支出

杜人淮 曹超

摘要: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针对我国军事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矛盾突出问题,采取了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大致经历了抗美援朝前夕“主要支援战争,其次用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一切服从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边打、边稳、边建”的三个阶段。其措施主要有4个:确立抓住重点、同时顾全大局的战略指导原则;作战指导上使作战规模与国家经济力量相适应;加强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强化监察工作;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障战争需要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执行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升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美援朝;军事支出;经济建设支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597(2024)03-0056-07

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这一战中国“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1],把美军彻底赶回朝鲜三八线,逼迫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挫败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为国家发展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总体战,不仅是双方军事、政治的较量,也是双方经济的较量。面对强敌,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内一穷二白,需要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战争消耗大量资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协调好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2]。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围绕抗美援朝战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就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问题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问题,对今天党中央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大任务,加快推进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针对强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具有极为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3-03-04

DOI:10.19959/j.cnki.CN35-1340/C.2024.03.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研究”(20&ZD1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兴领域军民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22&ZD0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重大军事斗争的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研究”(23AZD074)。

作者简介:杜人淮,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国防和军队建设。

曹超,男,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一、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

“统筹协调”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确立的一贯思维和方法,毛泽东曾用十指弹钢琴作出过形象比喻,认为“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强调“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3]。1950年8月12日党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明确了“统筹协调”工作方法,指出“无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都应在统一方针、统一政策、统一任务和统一计划下,适当地分工,密切地合作,建立起既有统一领导又有科学分工的正确工作关系”^[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建设任务急迫而繁重,同时加强国防建设和完成全国范围解放必须要有一定军事支出,需要统筹协调好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借联合国名义组成“联合国军”参战后,党中央着手为入朝作战进行准备,不久作出了入朝作战决定。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运用“统筹协调”思维和工作方法统筹军事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并根据战争进程和战局变化作出相应调整,使之既能保障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又努力兼顾好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主要支援战争,其次用于建设”

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财政工作的方针是主要支援战争,其次用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亟须恢复生产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但要巩固新生政权和继续完成全国的解放任务,军事开支仍需要占较大比重。1949年12月2日,薄一波在《关于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1950年“军费支出占概算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是草案中所占百分比最大的一项”^{[5]49},当时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有些地方还存在残余土匪。实际上行政经费中的地方支前费,新解放城市军管初期经费,财务费中的运输费等,也主要为战争支出,因而这个概算草案基本上仍然是以保证战争胜利为主要任务。正如周恩来指出,“从预算的分配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5]66}。

朝鲜战争爆发前半年,除西藏、台湾和部分沿海岛屿以外的中国领土实现了解放,同时国内的财政经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书面报告中描述了当时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指出“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6]142},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想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6]142}。毛泽东认为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6]142}。为了争取这些条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6]143}等一系列措施。

按照党中央对财政工作的设想,拟在1951年财政概算中减少军费,将全部预算的70%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7]73}。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8]45},所以要着重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的平衡发展,“对于国防建设,也需要占适当比重”^{[8]46}。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断了党中央统筹军事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的设想,随即对之前的开支计划作出了调整。

(二)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一切服从战争”

这一阶段大致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到1951年1月第三次战役结束,财政工作的方针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9]112},在战场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10]452}。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党中央即刻把是否出兵入朝作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同步考虑了调整财政预算问题。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到出兵参战的国家财政支出方针,指出“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

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一九五一年度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11]202—203}。这事实上为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经济建设支出和军事支出确定了基调,即中国一旦参战,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基础上来谋划,也就是财政上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做好各种收入必然要减少的准备。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必须首先照顾战时财政与保证军事支出。1950年11月13日周恩来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后的财政工作方针时指出,“现在火已经烧到门前,‘救火第一’”^{[7]95},“不能不暂时搁下和平建设的计划”^{[7]95}。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两天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开篇指出了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一是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是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是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转入战争。中央决定以第二种可能为基点,把1951年财政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基础上制定方针,也就是要增加军费支出^{[9]111—112}。根据这次会议决定作出了“战争第一”的财经工作方针。陈云指出“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9]115},同时强调“一方面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9]115},而不是有多少用多少。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财委决定财经工作的基点从平时经济建设转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来,财力、物力都要首先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即抗美援朝早用、多用、先用、急用,经济建设迟用、少用、后用、缓用。

坚持“战争第一”的财政工作方针和部署,不能把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进行削减和收缩。陈云指出,“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9]115},凡是“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有直接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9]115—116}。这就需要协调好战争、稳定市场、经济建设投资等支出关系。在处理战争、稳定市场、经济建设投资等支出关系上,必须要有先后主次和轻重缓急,总的要求是战争第一。1950年12月21日,“根据新的财政工作方针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制定的1951年财政支出总概算,总支出为69.5万亿元,其中国防费为33.4万亿元,占48.05%;经济建设费为11.8万亿元,占16.9%;社会文教费5万亿元,行政管理费11.2万亿元”^[12]。而后编制的1952年度和1953年度财政收支总概算,军费支出比例虽有所减少,但数额是增加的,总的方针仍是保证战争需要。

1950年12月3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一九五一年概算的总方针是:既要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如此,方能使前方胜利与后方巩固得以结合起来,稳步前进”^{[10]452},强调“支出概算,国防经费加预备费已超过总数百分之五十,而经济文化建设及行政业务经费合共只占百分之四十二,已不可能再少”^{[10]452}。这表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虽然加强国防力量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但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力量等现实状况,不可能做到一跃而成,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加速中国的国防建设。据此,1951年党中央将量入为出明确作为财政收支的主要原则,使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协调平稳。

(三) 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边打、边稳、边建”

这一阶段大致从1951年1月第三次战役结束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财政工作的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所谓“打”,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所谓“稳”,就是稳定国内秩序,包括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所谓“建”,就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内的各项建设。“边打、边稳、边建”是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一面保证作战需要,确保取得战争胜利,一面稳定国内秩序,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一面促进国内各方面建设,用国内建设新成就更有力地支援前方作战,使中国各领域都兴旺发达,互相促进,实现螺旋上升。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期性、持久性有较充分认识。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特别提醒,“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11]421}。第四次战役开始后,党中央深刻意识到,没有国内各项工作的有力支持和配

合,没有后方的巩固,保证战争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就很难完成,因而,国内社会的稳定、国内建设的恢复、国防力量的加强不可以有须臾忽略和放松。1951年2月,周恩来指出,“朝鲜战争会长期拖下去,不是一两个战役即可结束的。因此,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13]127}。

1951年4月2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三年准备,十年建设”^{[7]183}。1951年至1952年,党中央基本按照一边境外打仗、一边稳定国内秩序、一边积极推进建设的要求展开各项工作。1952年5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根据朝鲜战局、停战谈判形势和国内情况明确了“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周恩来在第二天的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指出,“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关键在‘稳’”^{[13]231},在第三天的国防工业会议上强调,“在党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导下,建设费应高于军事费。军费开支,能节省的就要节省”^{[13]231}。1952年9月,中财委提出“巩固国防,稳定物价,重点建设”的财经工作方针,明确三项任务不分先后。1952年12月22日,毛泽东指出,“我国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进行国家建设”^{[14]642}。党中央确立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促进了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加强,持续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物资需要,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举措和效果

中共中央在入朝作战问题上非常慎重,对是否出兵的利弊做了充分的研判。毛泽东认为,若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14]212},若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14]212}党中央作出出兵入朝作战决定后,对这场战争可能给国内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了充分估计,并做了最坏打算。事实证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不仅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一)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举措

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保证重点建设,同时兼顾其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对有限资金和建设力量的安排,始终兼顾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的实际需求,“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15]428},“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胜利,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这是我们制定计划的出发点”^{[15]429}。党中央为充分兼顾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完成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15]429}。但同时党中央指出“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15]429—430}。

坚持把保证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为根本指导原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为了保证和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国大幅度增加了国防费支出。1950年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41.1%,1951年国防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约43%^[16],此外还有一定数额的苏联政府贷款。如果战争长期打下去,将给国家的经济造成极大的负担,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将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经过双方的反复较量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后,党中央抓住美国被迫谋求和谈的时机,于1951年夏适时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举行了停战谈判,适当地减少了大规模的作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用于战争支出的负担。到1951年下半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全部得到恢复、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好转,进一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作

战提供了财力支持。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和用于战争支出的增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活动逐渐增加,作战规模逐步扩大,先后进行了1952年秋季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仅1953年金城战役一仗,就消耗各种弹药1.9万吨,相当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弹药消耗总量的2.2倍,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签字停战。

加强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强化监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统一了国家的财政工作,“国家财政工作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是完全统一起来了”^{[17]162},为了统筹协调各方面的财政支出,从1951年起党中央对全国财政收支系统进行了重新划分,实行中央、行政区和省三级管理制度。加强对国家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分级负责,旨在能够较好平衡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为避免浪费,力求国家财力的合理使用,1951年实行决算制度和预算审核,强调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和货币管理^{[9]121-122}。1952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1951年财经工作的缺点,认为“财经系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8]22}，“对财政支出管理不严”^{[18]22},明确1952年的财经工作要“加强财政监察工作……建立中央、大区和省的财政监察机构,重点考核财力的使用是否适当和有效”^{[18]23},同时要求“开始建立部队随军银行,实行货币管理”“重点试办独立会计制度”^{[18]23}等。这些举措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发挥了积极作用。

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以保障战争需要和促进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协调和平衡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满足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1951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毛泽东要求确保即使和平谈判不成功,“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11]558}。1951年10月9日军委决定大幅压缩军队总规模,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批准施行的《军事整编计划》,规定3年内把军队总员额控制在300万人左右。1952年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把41个师、11个团共46.5万人转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截至1952年10月底“共精简19个军、73个师,近200万人”^[19]。同时在朝部队也开展了精简节约运动,“裁并兵团、军、师直属机关,减少机关和勤杂人员”^[11],号召节约使用物资,尽可能利用缴获物资武器等等。为推动增产,各地积极探索并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措施,比如东北地区作为试点推行计件工资制^{[17]119}。全国工人、农民等纷纷订立爱国公约,推动生产竞赛,大规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涌现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刷新了生产纪录,提高了技术水平,有效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仅1952年全年增产节约总值达到317789亿元^[20]。

(二)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党中央在考虑是否出兵入朝作战问题上,其中最大忧虑之一就是经济的恢复,担心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依据国际局势和战场形势的变化,对财政支出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排,在战争极为艰难和关键的1951年国防战备费占比达到最高,随着战场形势的稳定,后两年的国防战备费占比不断下降,尽管这一时期国防战备费支出较高,但其他各个方面建设费都有兼顾,总体上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有力提高了财政支出的综合使用效益,不仅较好保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而且有力保证了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国防建设的加强等方面需要,把战争对国家的消耗程度降到了最低,全面促进了国防和经济发展。

增强了国防实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协调政策大幅提升了我国国防实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21]86}。一是自力更生发展军事工业。1951年1月,鉴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装备、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以及中国军事工业的极端落后,库存武器、弹药、车辆等惊人空虚和向外订货的种种困难等现实状况,为了适应前方作战需要,加速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军工生产能力,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确定兵工建设方针和原则,大力加强军工生产和建设。二是争取外援提升军力。把军事支出的一部分用于向苏联订购各种武

器和器材,用于朝鲜战场和增强军事实力,通过“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11]507}。三是坚持走精兵之路。1951年10月,根据国际国内情况变化,利用朝鲜战局较为稳定的时机,党中央实施精简整编方针,周恩来审定了人民军队三年(从1951年到1953年)整编计划,拟将机关、步兵作为主要缩减对象,加强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和院校建设。

提升了经济实力。毋庸置疑,抗美援朝战争本身付出了巨大的战争消耗,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但通过实施“协调”政策,国内经济非但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得到了迅速恢复。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蕴藏于群众中的巨大能量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在创造战争奇迹的同时,创造了经济奇迹。1951年,中国实现财政收入133.1亿元,比预算的69.5亿元增长了91.9%,比1950年增加104.2%。“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22],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而是更加向前推进了。1952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1951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稳定了国内市场”,表明1951年度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基本平衡。195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加344亿元,达到810亿元,三年中平均增长了24.6%,实现了预期三年国家财政收入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到1952年底,国内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需要,而且全面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工农业生产均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钢铁、煤炭、棉布、粮食、棉花产量和大牲畜的存栏数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彻底消除了财政赤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三、主要启示

“抗美援朝的战争,实质上是和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23]党中央采取的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深入研究和分析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当前中国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同步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一是按照安全和发展相兼顾要求进行全面筹划和部署。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始终以保障战场上的胜利为中心统筹安全和发展,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军事部署进行全面调整,确保财政支出既要保证前方的作战,又要保证后方的建设,正如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工作时指出的,“我们伟大的人民一面进行着经济的巨大的恢复和建设,一面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志愿军,使我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供应和正气磅礴的精神鼓舞,使我们得以顺利地打击侵略者”^[24]。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不可偏废。统筹安全和发展,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又要不断促进发展,持续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必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当前,急需加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高度全面统筹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既要保障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以及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要保障国家建设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需要。

二是着力谋划和大力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度融合。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初次尝试,尽管这次尝试是在外因的推动下被迫实施的,但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次尝试使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的大系统层面深刻理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即“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21]86}。这种关系处理是否得当,不仅直接影响战役战斗的规模,而且关系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即两者的战略关系的“大”会影响战役战斗的“小”。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战争不断趋于

高端化,作战的物资消耗越来越大,军费开支也将越来越大,军费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只有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度融合,才能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相协调,才能打通国家综合实力向先进战斗力、体系对抗力的转化路径,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

三是根据形势变化需要适时调整财政方针和政策措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在不同阶段灵活采取了不同财政政策,提高了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为中国正确处理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平衡协调军事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提供了宝贵经验。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9]¹¹⁵。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要根据形势变化确定正确财政方针和采取正确措施,军费开支不仅不会影响或阻碍经济建设,而且可以推动经济建设发展,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更好保卫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利益。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175.
- [2] 雷英夫.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完)[J].党的文献,1994(5):39—49.
-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2.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49.9—1950.12):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467.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4册[M].人民出版社,201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294.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10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44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05):第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9]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8.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工业卷)[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652.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6.1—1957.12):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2] 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02.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5.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88.